

重点阅读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机器人》:

■新知新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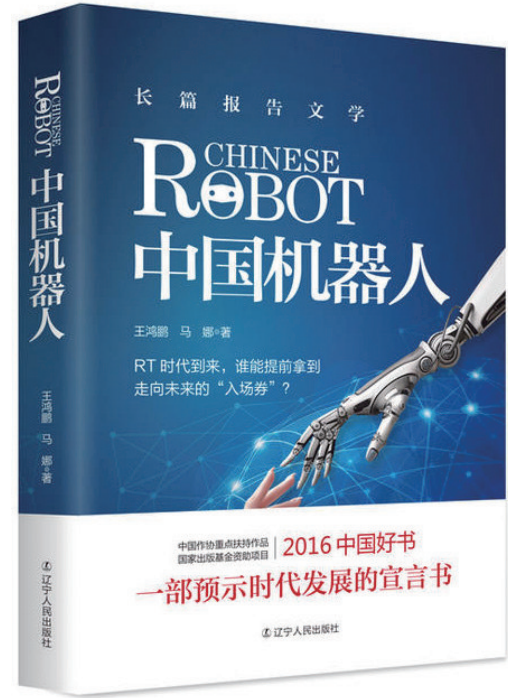
“另类”的科学家和“另类的人”

□李炳银

自从1920年捷克作家雷尔·卡佩克创作舞台科幻剧,创造性地推出了一个捷克语中称为“Robota”(农奴)的机器人之后,人工机器人这个“另一个人类”就在世界上出现了。后来,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又为“机器人”提出“机器人学三大定律”,因此被誉为“Robot”之父。1954年,美国人研制成功第一台可编程机器人,此后机器人在世界不少地方不断被创新和应用。2016年3月,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与“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五局大战,最后李世石1:4失败,这不仅将机器人的现实表现和未来可能性作用鲜活地表现出来,也使人们对机器人的印象和理解关注更进一步。在这个机器人风起云涌的当下世界,中国的机器人水平成果及运用情况如何,自然也成了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对象。

就在此时,由王鸿鹏、马娜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机器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深入系统和真实描述中国机器人从开始立项到快速发展,如今跻身世界强国精彩内幕情形的作品,是一部揭示中国机器人研制创新及迅捷发展应用的文学史记,也是一个中国人自觉走进人工智能“王国”,以坚韧的意志和智慧的能力积极进取、努力创新,不断追求科技强国梦想并开出灿烂之花的实际见证。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需要一种现实的关注和前沿引导的实际姿态。两位作家选择这样包含新锐科学性和浓郁科学家精神情感性格的题材对象书写,表现着对国家创新成果和科学家迷人故事的兴趣,是文学有积极健康追求和引导的表现,很能体现国家坚毅前行的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机器人研制的时间相对较晚。1972年,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吴继显、蒋新松、谈大龙三人提出《关于人工机器人》建议报告开始,机器人的课题研究方才在中国正式登场。当这个建议和一系列研究课题提出的时候,中国的广大人们以至科技界的不少人们,对此还是非常陌生。得知蒋新松他们要接触机器人研究,竟然有人说:“中国到处是人,都下岗了,你们还搞什么机器人呀!”“现在,国家在搞计划生育,连娃娃都不让造了,你怎么还搞机器人?”还有人无不恐慌地说:



“机器变成了人,那还了得!”可见,中国机器人的开始是何等艰难。但是,终究还有不少像屠善澄、杨嘉嘉、王大珩等具有科学视野的科学家和宋健这样懂科学的领导,机器人的研制开发项目终被列入“863计划”,切实开始启动。如今,当人们看见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机器人在深海太空自由行动,新松公司的各种机器人在各个工业制造和服务部门神奇活动,并强势占领中国市场,已有不少走向世界,为祖国赢得尊严和财富的时候,人们才会切实地感受到蒋新松、曲道奎等很多新老科学家的历史和现实功绩价值,对此感到自豪和欣慰!

《中国机器人》的写作,是在对中国机器人研制开发应用居功至伟的科学家蒋新松不幸英年早逝之后进行的。可以说,没有蒋新松时代的敏锐感觉和世界性的视野及战略性的科学追求,中国的机器人项目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在没有蒋新松在场的情况下,如何真实清晰而又生动文学地将中国机器人的发展道路及其丰富曲折内容真实呈现,是个遗憾困惑的存在。

但是,王鸿鹏、马娜在深入现场采访和用心收集阅读相关资料之后,以当下人物的在场行进作为和访谈内容作为明线延伸对象,又将中国机器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相关内容回叙穿插其间,作为重要隐性背景与真实存在同步推进,这样,就巧妙地在以往和现实的有序交叉交缠与互助中,实现了中国机器人道路历史和现实状况的文献文学表达,使人们得窥全豹。这里体现着作家的写作用心,也使真实壮伟的报告文学对象得到客观的表达。

王天然、曲道奎、王越然等中国机器人的科学人生,是见证中国机器人历史的当事者、戏中人。他们是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蒋新松的同事或学生,也是今天中国机器人研究发展推动的业中主将。两位作家正是在对他们的访问过程中,由他们及不少人的回忆和介绍,厘清了中国机器人的曲折发展经历,记述下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细节故事。蒋新松和他们自己,怀抱

国家担当使命,勇于探索赶超世界科技前沿,精心潜研,尽心竭力,无私奉献,顺势而动,终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艰难环境下图发展,没有使中国在机器人这个新时代背景下的科技浪潮面前掉队,为国家打造重器,赢得尊严,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向世界展示精彩中国故事,书写了人生与科学的华章。作品中记述了不少有关蒋新松人生和科学道路的情景,他自小接受母亲有关国家教育而树立的报国献身精神故事,他学业优秀却人生坎坷厚积薄发的情景,他勇于担当和殚精竭虑的科学性格行为,他乐意教育、热心培养新人的无私品格,他刚刚步向辉煌却不幸英年早逝留给人们的伤痛等很多情形,都让中国机器人事业打上了清晰的蒋新松的印记。作品中这些虽然不是作家现场观察面对而是由他人转述的蒋新松的科学人生内容,或许带有理性的色彩,但由于内容本身的生动饱满而使人不时产生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富有文学的感染力量。

毫无疑问,曲道奎是今天中国乃至世

界机器人舞台上的一位风云人物。曲道奎在精神情感和性格行为上都似乎受他的导师蒋新松的许多影响,在他的思想情感和科学行动中存在“新松基因”,“新松精神”,他由生疏机器人,到就学蒋新松后对此业痴迷发力,同样表现出一个富有传奇魅力的科学人生故事。曲道奎同样具有很强的国家情感和使命担当精神,他毅然放弃在德国游学时德方有关单位的殷切挽留和丰厚舒适生活回到国内,他在机器人科研开发方面的用情投入和智慧决策,他在相关领导的热情支持下将机器人研究制造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胆实践,他在绘制中国机器人发展蓝图时的坚韧远见抉择等,都多样性地表现了他的科学理性和睿智才能。正是他带领新松公司叱咤风云,活跃于国内国际舞台,在新的科技时代潮流迎风破浪,书写动人的诗篇。曲道奎和他的团队将中国的机器人的大戏唱响,《中国机器人》也将曲道奎等英雄形象真实生动地推向了前台,为人们他们在识得蒋新松的同时,也更加清晰理解感受到他的机器人科学传奇。

科技创新发展是国家和世界的时代主题潮流,文学在这样的潮流面前应当具有一种自觉的拥抱和知性精神行为。王鸿鹏、马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机器人》,是文学自觉走向时代主流,并勇于投身其中真实生动表达的很好成果。这样非常富有时代前沿的科技精神的人物故事,需要很好的讲述传递,是文学在同时代生活融合过程中寻找和发挥自身力量的很好途径。机器人是一种似乎生冷的科技物质对象。但在每一台机器人的背后,都存在科学家的精神性格和情感温度。在“中国机器人”的身上,我们就总能感受到作家文字中传递出的对于像蒋新松、曲道奎等等许多新老科学家的精神情感感动和他们性格的特点,对他们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和崇拜。也许作家还可以减少一些文献性的记述,再使相关人物的生活经历及命运性格描述充分,但《中国机器人》作为一部表现相关科学家社会生活奋进命运的写实报告,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独特的表现与收获。

《《中国机器人》,王鸿鹏、马娜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拙著《批评的现代性维度》与读者见面了。为什么要把“现代性”纳入我的文学批评呢?有必要向读者朋友做一简单交代。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长,至少比文学创作时间短得多。文学批评仅仅作为哲学思考的一个途径,透过大学表征,看取万个世界,我以为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论。说实在的,这些年搞文学批评,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批评究竟是什么,要发挥怎样的作用,批评为什么越来越没人信了,广受质疑和诟病,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与批评界的朋友们每每论及都躲不开的话题。其实,说透了作家们的创作问题和文学批评存在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现代性”问题。创作是这样,批评更是这样。

黑格尔曾经说过,概念构成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网结。说起“现代性”这个概念,话题就长了。这个词本身就是指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同时也是指理性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西方在16世纪以前也是没有现代性的。直至16世纪初到17世纪伴随着法国启蒙运动,出现了影响世界进程的“三大发现”,即“地理大发现”、“知识科学大发现”和“人的发现”。特别是“人的发现”,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诞生,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我们从西方美术史就能直观地看出,那个时期西方绘画雕塑的主题就是“人”。如果要问什么是现代社会,我认为“人的现代性”就是最为主要的一个指标。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的现代性,其他所谓的现代性都是伪命题。回到我们国家,在学者李欧梵看来,中国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初,“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对于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

■开卷絮语

批评的现代性维度之我见

□赵炳鑫



有多么觉醒或者有多么不觉醒。中国的现代文学,同样是肇始于五四时期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实就是写人的不觉醒状态。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深刻的,那就是“吃人的社会和吃人的文化”,并为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这是鲁迅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后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作出的振聋发聩的批判,虽然现在来看也有偏颇之处,但不可否认,《狂人日记》在开启民智、运用理性方面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的启蒙价值,其意义是深远的。后来,随着时移世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学回到了那种伪道德、伪善、伪君子的套路,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健康生态。哲学家邓晓芒说过:中国作家老是想着“回归”,凡是想借助于回复到人的自然本性、回复到植物和婴儿或天然的赤诚本心来沟通与他人的人,都必将消灭

可能性,即消灭人,都必将导致不可解的悖论。

曾记得季羡林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看,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有些人看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傲视全球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世纪。而另一层意思是,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看,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联系在一起,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必须以整体性的全面改革予以应对。这也正如邓晓芒所说的:“这是一个人类和人性的全部矛盾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最突出地由14亿中国人展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世纪。”它表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最为剧烈的‘化合反应’”。谈这个背景,就是说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以前的传统农耕文明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尽管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中国目前处在几种社会形态共存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東西,共存这个社会里。”有存在主义,有现代、后现代,有消费主义,有封建主义,有传统主义等等。但主流的社会样态,还是以民主、平等、自由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虽然我们的现代性还不充分(有些学者以为我们的现代性已经过头了、需要回归,其实我们的现代性还远未完成)。这是我们的国情,同样也是我们从事文学活动的语境。不论是文学创作或者文学批评,离开了这个语境,一切问题都是伪命题。

我之所以要把“现代性维度”纳入我的批评视野,原因就在于

此。虽然我知道面对一些作家,有时对话本身就不太对称,但我还是愿意去发现他们作品中的“现代性”因子。我以为批评家的功能和作用就在于此。作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没有自觉到的,就是要通过批评功能让他们意识到、自觉到。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秉承和践行的批评观。

这本集子大致应该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当前文学思潮的看法和观点。这一部分量不多,但谈及的面比较广,涉及到当前的文化精神现象,这也是我多年习学哲学所得,可作为对当前文学语境的探索和解析。重点部分则为后一类,是我对作家创作个案展开的研究。我知道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特别是就文学谈文学、从传统的审美谈文学,在学科规定性上谈文学,大多数高校文学学科的教师做的基本都是这些工作。从近年来对社会的观察和自身阅读积累出发,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资源已无力支撑对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现实文本的阐释。现代社会需要与之相应的现代理论。就文学而言,同样现代文学也需要现代文学理论的引导和分析。如果两相不对称,势必会错位,驴头不对马嘴。文学是入学,文学反映的是人的“此在”状态。现代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前现代文学,主要在于其价值标准不一样。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这几年不遗余力开展的一些文学批评,纳入我批评视野的作家,我都是在用“现代性”这一标准来衡测他们的创作。对每一位论评者,我都力求真诚对待,认真研究,发现他们创作的异质,鼓励和引导他们的创作。究竟作用有没有、有多大,不是我所考虑之事。悟道有先后,修行靠自己,在我,做了就行了。

《《批评的现代性维度》,赵炳鑫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文学的“现场”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民国文学”的研究者主张还原历史现场,“重返八十年代”倡导者努力重返的亦是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然而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不论是“民国文学”的还原还是“重返八十年代”的重返,尽管可以不断去除历史的迷障,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用诸多材料搭建起来的终归仍是过往历史的模拟空间。王春林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体现出与上述研究者相似的现场意识和求真精神,但却是把正在进行的文学作为描述的对象,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现时存在的文学时空,是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的一种“实时监控”与“同步记录”。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的评论对象为2013年1月至2014年八九月间出版的或期刊刊发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兼涉除诗歌之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话剧等文类。全书分11个单元,每单元设定一个主题,各单元所选作品依此各有侧重。为了能较为全面反映一个时段(基本以两个月为一时段,与文学类双月刊的出版时距一致)的文学状貌,也有一些与此主题有一定距离的作品。全书编排上的另一贯穿始终的线索便是时间线索,即各个单元中除个别作品因主题设定的原因有所微调外,所选作品基本以两个月为限,每个单元所涉作品基本都是两个月之内所出版刊发的作品,前述微调作品刊发时间上的前后延伸也基本在1至2个月之内。这本书的写作是以王春林2013至2014年间为《长城》杂志的“文情关注”专栏的写作为基础,全书中11个单元的排列顺序其实也即写作时间顺序的自然排列,本书可以说是对2013至2014年文学创作面貌与脉络的几无时间差的同步性呈现。

王春林是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少有的坚持对当下文学发展状貌进行追踪性研究的研究者。从本世纪初始,王春林每年都要写一篇长篇小说年度发展态势分析的文章,多年下来,积有十余篇,依时序排列,俨然已是一部“新世纪长篇小说史”。《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的写作则更进一步深入细部,作一种几近“近身肉搏”的探究,把文学发展态势俯瞰这样宏观的研究以一种更加微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于他这样一种当下性与即时性的研究,王春林在本书后记中有这样的话:“我清楚地知道,在当下的高校内,有很多人并不把文学批评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准备,但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只能构建基于充分的文学批评实绩上。倘若缺失了文学批评的充分支撑,一部理想的文学史的建构绝无可能,因之对本书做了这样的定位:“希望以此而为未来的文学史写作做一种坚实的学术准备”。对于王春林的追踪式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这样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王春林虽然仍把自己的写作视为文学批评,但其背后显然有着历史建构的意图,他往往是在文学史的高度与视野中审视与分析作品。本书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努力:

首先是力求完整呈现某一时段文学全貌。全书在各个有特定主题的单元中,除对与本主题相关的作品作重点分析外,也会涉及其他与本主题关联较疏但出版刊发于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如在“非虚构文学及其他”单元中,除对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寓真的《张伯驹身世钩沉》、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做细读式的详尽剖析外,还涉笔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中篇小说《朗霞的西街》《而黑夜已至》等。《“空巢”《黑白》与布尔津的三重奏”一单元中主要是小说分析,但加入了舒瑜瑜散文集《说吧,从头的说起》的评论。

其次是书中有不少立足于文学史层面的对某些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比如对王蒙《这边风景》中的爱情书写,王春林认为“完全应该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感人最有诗意的爱情诗篇之一”。

再次是把作品置于文学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对其作分析与评判。王春林把五四以来白话文学史上的乡村叙事依时间顺序概括为五种,即以鲁迅及五四乡土作家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以沈从文、汪曾祺等为代表的田园叙事,肇始于茅盾至“十七年”“文革”达到鼎盛的阶级叙事,“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中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为代表的家族叙事,晚近的以贾平凹的《古炉》、阿来的《空山》为代表的方志叙事。他先用较长篇幅对这五种叙事形态的论述建构起文学史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中对作品作出评判。

最后是能超越各种复杂的现实关系,不虛美、不隐恶,超越个人的偏好对作家作品作客观冷静的分析,体现出一种史家的精神。对于这种追踪式研究而言,由于研究者与作家同处一个时代,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要做到说好、坏处说坏这样看似简单的要求其实非常不易。本书难得的地方在于即使面对当下活跃的知名作家,也能直言其作品中的不足,不为尊者讳。

另外则是对自我立场自我艺术偏好的超越。王春林是一位多年来坚守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立场、作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家,对于蕴含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普泛悲悯情怀的作品有着特别的偏爱,即使对于不再以再现现实为主要特征的非现实主义作品,王春林也往往会挖掘其中的社会历史内容,阐释其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悲悯情怀一側的内涵。但其他也能超越自己的立场与视角,对作品进行多方面的审视,并不仅因某些作品在这些方面的突出呈现而予其简单的肯定。

其二,这种对文学的追踪式叙述本身的文学史意义应该得到重视。研究界一直有当代不写史的说法,对于时间间距过小的历史的书写之所以不能成为信史,与历史书写者同其书写的历史空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从既是自己生存空间又是书写客体的时空中超脱出来有关。但是拉开时间距离后,再逼真的历史还原其所恢复的也只能是模拟的历史时空。面对在时间之流淘洗中变得越来越简洁的历史,历史书写者可能更容易看见其“骨骼”、“脉络”,但问题是这样一种失去丰富与鲜活的历史,离真相是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远?拉开时间距离后对于过往历史的书写与当代写史相比之所以更被视为信史,其“信”度的提高未尝不与丰富鲜活的历史细节被时间简化化后对历史阐释的空间被窄化有关。从这个角度看,王春林的这种对实在的而非模拟的当下文学状貌的现场书写,记录了许多正在成为历史的文学现实的细节,保存了更多的文学真相。况且王春林在做这样的现场书写时有着明显的历史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可以说是历史视野中的现场书写,它所记录的是更为绵密、更具质感的文学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王春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场的同

步批评也

是一种历史建构

□王晓瑜